

● 欧美史

苏联对早期欧洲一体化的反应与影响

严 双 伍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严双伍(1957-), 男, 安徽桐城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和欧洲一体化研究。

[摘 要] 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的欧洲联合运动中, 苏联持一种坚决反对的态度, 并采取了一些可能的措施予以反击。导致苏联这一立场的根本原因在于, 其主要领导人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追求。此外, 苏联战后在东欧的扩张与干涉, 反而从事实上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关键词] 苏联; 欧洲一体化; 反映;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5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2-0170-06

在二战中遭受纳粹侵略的所有国家中, 惟有苏联不仅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 而且在战争中崛起, 成为惟一个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当然, 苏联人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从历史上看, 迟至 18 世纪中叶, 俄罗斯才以大国身份挤进欧洲大国政治的舞台。在整个 19 世纪, 欧洲列强并不认同俄罗斯的“同族”身份, 俄罗斯也从未在精神层面上真正融入欧洲。二战后期, 东欧诸国是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解放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东欧国家“新政权的建立与苏联直接的军事影响和政治压力有着直接关系”^[1](第 313 页)。在 20 世纪中叶的欧洲人和苏联人眼中, 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是与势力范围和地缘政治因素紧密相连的。在东西欧历史分界线的两边, 一边是虚弱不堪、百废待兴的西欧, 一边是政治、军事力量空前膨胀、历史上具有扩张倾向的“苏联帝国”, 两边的价值观念又截然不同、尖锐对立。在冷战的背景下, 西欧国家感受到了巨大的安全压力和精神威胁。我们早已知道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 当时都没有与对方开战的意图。但那时的欧洲人却觉得战争随时可能再度爆发, 而且与二战比较起来, 他们将处在更为不利的地位, 几乎没有交战的能力。对人类来说, 大到国家, 小到个人, 在威胁面前生存自救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安全, 西欧选择了美国的保护; 为了壮大自己, 西欧选择了走向联合的道路。

一、斯大林时期苏联对欧洲联合的态度和反应

1917 年“十月革命”后, 布尔什维克政权先是处在西方军事干涉继而又处在西方政治孤立、经济制裁的“隔离”状态, 美国直到 1933 年才正式承认了苏联, 1934 年苏联才被接受进入国际联盟。战争期间, 只是因为纳粹德国的侵略、民族存亡到了关键时刻, 西方和苏联才结成了反法西斯的联盟关系。这里的“反法西斯”一词非常重要, 它界定了这个联盟除了应对共同敌人之外, 没有别的基础。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发表的广播演说, 也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鉴于苏联与西方交往的历史经验, 斯大林对任何欧洲联合的主张都极其敏感, 认为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2](P. 3)。他在反对美国人有关欧洲联合的建议并向美国人施压的同时, 严令欧洲各国共产党

不得支持这一要求。为什么欧洲各国共产党战时战后没有一个卷入欧洲联合运动,其原因盖出于此。据西方学者研究,约从1942年5月起,苏联在公开场合或私下接触中经常表示对战后建立欧洲组织的反对^[3](P.68-72)。1942年1月23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签订了“波捷协定”,规定在战后两国组成“波——捷联邦”,采取共同的外交、军事和经济政策^[4](P.136)。这一方案1943年在苏联的坚决反对下被迫取消^[5](P.362)。可以说,战时东欧国家曾经非常活跃的欧洲联合运动,正是在苏联的大力封杀下逐渐走向衰落的。1944年1月,苏联驻伦敦大使伊万·迈斯基(Ivan Maisky)和前外交部长马克西姆·M·李维诺夫(Maxim Maximovitch Livinov)强调:“培养各种各样的联邦——多瑙河、巴尔干、中欧、斯堪的纳维亚等等,至少在战后初期,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他们的理由是,为了保持苏联在欧洲不可挑战的地位,就不能容忍某种国家集团的平衡力量的出现。1944年11月,李维诺夫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战后应尽力避免一个反苏的美欧同盟的出现^[6](P.85-86)。1948年1月,苏联《真理报》公开发表文章,宣称不赞成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建立巴尔干联邦的计划(该计划起源于二战期间),由此导致苏、南冲突的公开化^[7](第225页)。

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层之所以反对欧洲联合,除了现实中的地缘政治因素、历史因素(从拿破仑到希特勒)外,最基本的原因是源于他们对时代的看法。列宁在20世纪初曾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欧洲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欧洲联邦”口号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所谓无法实现,是指在资本主义时代,“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所谓反动,列宁是指在当时欧洲列强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中,这种联邦事实上“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8](第707-708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曾对帝国主义联盟进行了分析。他说:“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8](第837-838页)列宁上述的看法,当然是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状况的。斯大林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我们过去所熟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这一理论最初提出于20世纪20-30年代,到50年代初最终定型,集中体现在斯大林生前的最后一部理论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运用总危机理论来观察二战后的世界,即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以及两个“平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是危机重重,尽管“他们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略战争、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解脱这些困难情况。但是,这很像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9](第595页)。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由于总危机将不可避免地要爆发内部冲突。1945年11月,根据莫洛托夫的特别指示,迈斯基就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交了两份备忘录。他的结论是,美国——仅仅出于经济原因,“也将会怀疑地看待由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联合组成的西方集团的各种计划”^[6](P.86)。1946年8月,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E.瓦尔加(Evgeny Varga)在其所著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之变化》一书中谨慎地提出,二战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军事化以及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使资本主义比以往更易于管理和一体化。但斯大林则断定:“如果各国能够采用协调的和和平的解决办法,根据它们的经济实力来定期重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那也许可能避免战祸。但这在目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发展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6](P.86)“马歇尔计划”提出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分析了瓦尔加的研究报告后认为,该计划是为美国商品打开欧洲市场防止经济危机的安排。他们斟酌再三,认为苏联参与这一计划潜在的安全危险大于可能的经济效益。假设当时苏联表示参与“马歇尔计划”,则该计划有可能告吹,因为美国担心的正是这一可能。美国的意图不仅是要控制英、法等西欧国家,还想左右在苏联影响范围内的东欧国家^[6](P.87)。为了抵制西欧的一体化计划,苏联提出了“莫洛托夫计划”,迅速与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双边贸易协定和友好互助条约,并于1949年1月正式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

可以看出,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对欧洲一体化的认识是比较片面、狭隘的,还是立足于传统的国际强权政治的视角把它单纯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争夺与控制的产物。

二、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和反应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一班领导人为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对苏联的内外政策均作了一定的调整,特别是苏联提出的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新战略,为苏联务实灵活地处理与西方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这一阶段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是谋求与西方国家缓和紧张的关系,如呼吁通过谈判解决一切国际争端,推动朝鲜战争与印度支那战争的停战,与希腊、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放弃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归还芬兰的波卡拉—乌德海军基地,希望苏日关系正常化等等。当时,苏联在欧洲的主要目标是,阻止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以及其后的《巴黎协定》的通过,反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和建立“欧洲军”。

比较起来,苏联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反应要比煤钢共同体强烈得多。对“舒曼计划”,苏联仅抨击它是美国资本控制下的“国际托拉斯”,是对德国的进一步分裂。即使是对1949年北约的建立,苏联也未做出多少具体的反应,而“普利文计划”一出笼,就引起了苏联的高度注意。1952年3月,苏联突然向西方提出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的照会。苏联是真的愿意推进德国统一,还是仅仅用来干扰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一种策略,就是从已经公布的苏联档案中人们也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对这一插曲,直到90年代,德国仍有学者认为是错过了一次统一机会^①。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阻挠防务共同体的意愿至少是照会的主要的动机。在欧洲防务共同体谈判期间,苏联通过多种手段对其施加影响,包括要求欧洲各国共产党阻止这一计划^②。1952年5月27日防务共同体条约在巴黎签署后,苏联立即发出了警告,如果德国继续军事化,那么苏联及其盟国将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防务共同体条约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旷日持久的大辩论最终导致了该条约被否决。1954年5月29日的国民议会审议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当投票结果出来后,法共议员和右派议员联手高唱《马赛曲》^③。防务共同体虽宣告失败,但美国重新武装德国的行动却没有停止。9月,英国提出了“艾登计划”这一替代方案,内容包括尽早结束对联邦德国的占领状态,改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接纳联邦德国、意大利参加,并进入北约组织,美英在欧陆长期驻军以消减法国的疑惧等。美英的动作极为快捷,10月3日,伦敦会议就通过了《最后议定书》。10月23日,正当《巴黎协定》签订之时,苏联照会美、英、法3国,建议召开4国外长会议,讨论举行全德自由选举,恢复德国统一,并举行全欧会议商讨欧洲安全问题。但西方视为宣传攻势不予理睬。11月13日,苏联又向美国和23个欧洲国家发出照会,在谴责《巴黎协定》“恢复德国军国主义”的同时,再次建议召开有美国参加的全欧会议,共同讨论欧洲集体安全问题,但遭到拒绝^④(第170-171页)。这样在美国的一手操纵下,联邦德国名义上在西欧联盟实际上在大西洋联盟的框架内重新实现了军事化。

苏联鉴于二战的惨痛教训对德国重新武装问题反应强烈,这既正常又合情合理。因为联邦德国的军事化,矛头就是直指苏联的。苏联被迫进行反击,1955年5月14日,《华沙条约》正式签署。值得注意的是,条约的序言中阐明了其针对《巴黎协定》的目的,条约第11条更明确规定,一旦欧洲安全机制建立,条约即行终止。这与苏联此时的外交战略是一脉相承的。根据苏联欧洲问题专家、后来葛罗米柯的助手安德雷·M.阿金托夫(Andrei M. Agentov)的阐释,50年代苏联外交新战略的核心,由“三大要素”构成:“最大限度地支持中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使之与苏联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在两大敌对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建立中立的‘缓冲区’;逐渐与北约国家建立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或多或少的正常的、和平的合作形式”^⑤(P. 89)。

随着西欧一体化的进行,苏联根据新的外交思路,加强了经互会的相关活动。经互会虽然在1949年1月就成立了,但它的作用、地位一直不明确,长时期内也没有自己的章程。在50年代前期它仅仅是个空架子,连会议都几乎不召开,更不说实际内容了。个中的原因也很简单,经互会的成立是应对“马歇尔计划”的。苏联自己正处在战争恢复时期,哪里拿得出钱来去帮助东欧国家呢?西欧联合的形势,使苏

东集团开展合作日显迫切。在这一情况下,1956年的第7次华约大会决定,成立经互会的常务委员会取代此前的临时工作组。1957年又决定将经互会的合作从贸易领域扩大到生产计划领域,并建立了由苏联国家银行控制的多边清算制度。1958年经互会理事会通过了苏联向东欧国家供应石油的协定。在东西方“和平竞赛”的思路下,苏联希望通过“社会主义联合”的方式,建立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市场”。为此,赫鲁晓夫部分调整了斯大林时期对东欧国家政治、经济高度控制的政策,试图通过苏联提供若干的援助,使经互会在某种程度上朝着互利互惠的方向发展。显然,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联合”看得过于简单,而实际上这一政策的结果使得东欧国家不顾比较优势,与苏联发展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从总体上说,苏东集团内部合作的成效是有限的。苏联的援助大多总是同政治控制相联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到合作深入全面地发展。在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甚至也出现了分歧。对隐瞒苏联对东欧的补助和贷款,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就发生了争执^[6](P.89)。后来,随着联邦德国和法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欧洲经济共同体显现出强大的活力。相形之下,苏东集团则难以望其项背,事实充分证明了经互会没有能力与其竞争,以致赫鲁晓夫后来不得不叹息:“不幸的是,在某个特定阶段,意识形态问题(例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和平竞赛的结局等)是由胃口所决定的——即看谁能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更多的商品。因此,一种或另一种制度的吸引力,严格地说是由商店橱窗里的商品、商品价格和工资来决定的。在这些方面,我们当然无法与西方竞争取胜,尤其是在西柏林。”^[6](P.91)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虽然意识到资本主义总危机不可能马上到来,必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但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层意义同样缺乏充分的认识。对《罗马条约》,苏联的态度是否定的。在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看来,“欧洲联邦”、“欧洲合众国”都只能是乌托邦,它的实质是美国拼凑起来的针对苏联东欧的经济、军事集团,是北约“在欧洲的经济基础”,其内在矛盾决定了这种联合不可能长久^[6](P.90)。1957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上刊发的《关于建立“共同市场”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一文,认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统一的经济体系,共同市场只是各国垄断集团达成的暂时的妥协,它必然会因为“损害较小国家主权”而导致矛盾激化,最终“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与斯大林时期一样,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对“联合欧洲”对自己的潜在安全威胁同样担忧,特别是在联邦德国经济进入“奇迹”阶段之后。为了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东山再起,苏联对联邦德国这方面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甚至于对戴高乐关于“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这一主张,也满腹狐疑^[6](P.90)。

三、欧洲一体化启动进程中苏联因素的作用

冷战是欧洲一体化启动的“助产士”。苏联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虽然在方式上与美国完全不同,但其结果却是一样的。

苏联因素首先表现在对西欧国家的安全压力上。今天看来,这一压力无疑被人为夸大了,但在当时它确实是西欧联合的重要外在因素之一,尤其是在1949年苏联掌握核武器技术以后。二战之后的欧洲人,对战争是谈虎色变。冷战初期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相互攻讦,柏林危机、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某种火药味,美国的原子弹间谍案、忠诚调查和麦卡锡主义的横行,所有这一切,使西欧人对东西方对抗的后果充满担忧,更促使他们在屈从于美国保护的同时,走联合自强的道路。

因素之二是西欧人对苏联模式的反感与拒绝。这里谈的苏联模式,主要指政治模式。至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那时相当数量的西欧人倒认为是一大长处,它被解释为苏联经济快速发展、成功击败纳粹德国的基本原因。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试验,我们现在还难以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历史还没有给我们应有的时空距离。但苏联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和权力滥用却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失误。西欧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许多欧洲左翼人士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极为熟悉,而且按照他们的理解做出过长期奋斗。苏联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西欧许多进步人士和人民都曾经为之鼓舞欢呼。我们

非常熟悉的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纪德等人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但苏联在 20 世纪 30 年代逐渐形成的政治模式却令他们大为失望^①。苏联惨烈的党内斗争和骇人听闻、牵连甚广的大清洗让人不寒而栗,苏联个人专权、缺乏民主、对社会生活的高度控制让西欧人在价值观上无法认同。刚刚经历过法西斯暴政的西欧人,他们追求一个联合的欧洲,这个欧洲的前提必须是自由的、民主的。不仅能保证他们的和平,而且能保证其自由和民主。战后苏联模式越出一国范围,扩大东欧国家,大大刺激了西欧人对一个自由、民主欧洲的渴求与向往。

因素之三是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强化了西欧追求独立与统一的决心。在东西方两大集团中,虽然美国也对西欧行控制之实,但它允许西欧国家享有相当的自主性,其手腕也圆润得多。一般不直接插手西欧国家的内部事务,涉及联盟间的事务,美国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大多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处理。这在表面上给人一种相对平和的感觉,也顾及到外交上的体面。比较起来,苏联就笨拙、强硬得多,动辄开除、制裁。它不允许东欧国家存在不同意见、不同集团和派别。这种以军事存在为后盾的高压政策使东欧国家实际上沦为苏联的卫星国,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苏、南冲突爆发后,在苏联的操纵下,南斯拉夫不仅被开除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该组织恰恰是应铁托的要求而建立的),而且苏东集团的国家统统与之断绝外交关系。在声讨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同时,东欧国家一批领导人或因“右倾机会主义”、或因“铁托分子”等罪名,被清洗出去^[7](第 255 页)。1953 年的东柏林事件,1956 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苏联公然出动坦克予以平息。这在西欧国家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应。此外,加之苏联自觉不自觉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等“帝国式”遗风,使得苏东集团内部的平等问题更显突出。在西欧人眼中,东欧国家成了苏联霸权的“牺牲品”。中东欧人民数百年来一直不屈不挠地反抗大国的控制,并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一战后,当他们从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长期奴役下解放出来,不久又面临德国法西斯的威胁,他们求助于西欧,成立小协约国集团、波罗的海地区联盟、巴尔干同盟等,但《慕尼黑协定》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附属议定书》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一切努力。二战中,他们英勇抵抗,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胜利到来时,全世界都在庆祝和平,他们却再次沦为苏联的保护国。东欧国家这一“悲剧性”状况,从另一方面推动着西欧国家走上反控制、反强权的联合道路^⑤。

上述三因素实际上是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一个整体,直接结果均是导致了西欧国家对苏联的恐惧。战后在西欧普遍存在的“苏联威胁”论,一方面客观态势上确实某种程度地存在这种倾向,但西方政治家故意夸大渲染并利用了这一公众气氛也是明显的事实。我们这里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断其是非曲直,仅侧重于考察其对一体化的影响和作用。

注 释:

① 关于德国学者这一观点,参见 ZUBOK, Valdislav,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in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istory*, Vol. 2, No. 1, 1996 p. 88. 脚注⑩。

② 参见 GUILLEN, Pierre “The Role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 Factor in the France Debates on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in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istory*, Vol. 2 No. 1, 1996 pp71-83; SOUTOU, G.-H., *La France et les notes Sovétiqes de 1952 Sur l'Allemagne* in *Revue d'Allemagne*, 1988 pp. 261-273.

③ GERBET, Pierre, *La Construction de l'Europe*, p. 181. 有关法国对该条约的讨论参阅 BARIETY, J., “La décisions de fermer l'échec de la CED et les accords de Paris”, in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1993 pp. 354-383; GUILLEN, P., “Les chefs militaires fran?ais le éarmement de l'Allemagne et la CED”; POIDEVIN, R., “La France devant le Problém de la CED”, 两文均载 *Revue d'Histoire de la deuxème guerre mondiale* 1983, pp. 3-33, 35-57.

④ 参见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⑤ GEUSON, Frans A. M. *Alting von, European Unifi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treasury of readings*, the Netherlands: Vidua Publishers, 1998. 参见张振江、任东来:《冷战后审视欧洲统一的新视角》《欧洲》2000 年第 3 期。

[参 考 文 献]

[1] 郭华榕, 徐天新. 欧洲的分与合[M] .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

[2] LIPGENS, Walter.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1939-1945; Vol. 3. General Introduction[M] .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88.

[3] LIPGENS, Walter. A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1. 1945-1947[A] . The 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ty Movement[Z]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4] WANDYCI, Piotr S. Czechoslovak-Polish Confederation and the Great Powers 1939-1950[M]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56.

[5] LIPGENS, Walter.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1939-1945; Vol. 2[M] .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86.

[6] ZUBOK, Vladislav.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J] .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istory, 1996, 2(1).

[7] 刘同舜, 姚青龄.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3: 第 8 册[Z]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8] [俄] 列 宁. 列宁选集: 第 2 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9] [俄] 斯大林. 斯大林文选: 下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10] 何春超. 国际关系史(1945-1980)[M] .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 桂 莉)

USSR’ s Reaction & Influence to Early European Integration

YAN Shuang-wu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YAN Shuang-wu (1957-),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intergration.

Abstract: For the European Union movement of during the latter of WW II and the early Stage of Postwar, U.S.S.R. attitude is resolute opposition. In the same time, U.S.S.R. took some Steps to Counterattack. The Principal causes of leading to this policy are U.S.S.R. leader’s view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Pursue of self-safety. Besides, its expansion and interference in eastern Europe after WWII promoted the proceeding of early European integration.

Key words: USSR; European integration; reaction; influence